

## 西南联大：民主堡垒

○吴征镒（1937生物）

1938年1月，我参加西南联大的“湘黔滇旅行团”来到昆明。八年抗战我都在大后方的昆明度过。

大后方的昆明绝不平静。一是不时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，特别是开始的几年，时常要跑警报。当时西南联大有两三间实验室和教室就被日本飞机炸倒。我所管理的植物标本大约有一两万号，幸好未遭轰炸。

二是西南联大师生的民主思想十分活跃，特别是接近抗战胜利的那几年，看到抗战即将胜利，渴望和平、不要战争的呼声日渐高涨。

西南联大作为“民主堡垒”的基础是形形色色的“读书会”和社团。在西南联大里，特别是在1942年至1946年几年间，里里外外不知有多少大小不一的读书会。西南联大的南墙，即民主墙，是西南联大民主精神火花的标志。各种各样的读书会，在民主墙上发表各种各样的民主观点，有公开的，也有半公开的，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。

1941年，发生新四军被“围剿”的事件，国民党反动派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主张暴露无余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，“千古奇冤，江南一叶，同室操戈，相煎何急!?”，时为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以此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，激发全国人民对新四军的同情和支持。西南联大的师生激情洋溢，民主墙上“一致抗战，一致对外”的呼声更加强烈。大后方的昆



吴征镒学  
长

明不平静，师生们提倡民主的呼声此起彼伏，民主精神在涌动，抗战热情在爆发。

进步社团中的“冬青社”很是活跃，不仅是声援“一致抗战，一致对外”的先锋，还输送一批骨干到滇南的墨江、磨黑一带，在基层开展民主运动，把民主思想扩展和扎根于民众之中。

我在“湘黔滇旅行团”中认识闻一多先生，一路走来，闻先生的学者气质、风度和阅历，让我增知良多。1944年，我从大普吉回到昆明，又得闻先生在思想上的许多帮助，介绍我参加了“十一学会”，加入了“民盟”。闻先生指导的“新诗社”和“剧艺社”是西南联大最为活跃的社团，我也时有参加，并有机会认识沈叔平、沈季平、黄海、何孝达、肖荻、郭良夫等，他们都是“新诗社”、“剧艺社”很有文艺天才的骨干。

1942年，我三年助教期满，考取北大

## □ 联大春秋

生物系的研究生，在张景钺老师指导下学习。不久，日本飞机如在长沙一样，每次来九架飞机轰炸昆明。逃警报成为家常便饭，西南联大的正常教学受到干扰。学校决定将我们北大生物系研究生搬到西郊的大普吉，借居于戴芳澜先生领导的真菌病害组所在的清华农科所。此时，我的高中好友胡光世（清华化学系九级），从化学兵部队撤下来到清华金属所，与清华无线电所的王天眷发起组织一个读书会。王、胡二位邀约戴芳澜先生的大弟子周家炽和我参加，后来无线电所的须驷宝（王天眷的夫人）、周国铨、陈芳允和数学系的田方增、清华化学系的一位姓李的女生也参加，读书会大约有八九个人。我们利用周日，在大普吉山边的丁记塘小树林内学习，主要学习毛泽东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和《论联合政府》。按中共南方局领导指示的“勤学、勤业、勤交友、隐蔽精干”的方针，每周日进行学习讨论，掌握两篇文章的精神实质。通过学习，使大家的思想和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。

在大普吉的三年后，由于美国空军的陈纳德飞行大队进驻昆明，有效地阻挠了日军飞机的轰炸，昆明、大普吉都比较平静，我们就搬回昆明城里。这时，我的好友胡光世离开昆明到重庆天厨味精厂工作。离昆前，他让我认识了章文晋（后是外交部副部长）、李之翰、周文燕，我知他们是中共地下党员。不久，我和工学院的杨捷又发起组织了一个小规模的读书会，有田方增（清华数学系）、许大德（云大经济系）、彭慧云、郭成珠（许大德夫人）和浙江大学的一位高姓女生。我们在昆明复兴街文化巷5号租了一间房子

住下，读书会经常在此学习开会。经过“一二·一”运动，受到党和革命实践的教育，思想进步较大，为后来参加革命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。1942年至1943年，我和好友陶光（云大中文系）在云南大学的映秋院，系统地读了鲁迅的各种作品，增进了对反封建、反殖民地的思想意识，是我人生思想认识转化的重要环节。

胡光世是我扬州中学的高中同窗。高三时，我参加过一次罢考活动，起因是学校要无故开除同班同学。我的同班好友胡光世、孙庆恺（后改名孙克）是罢考的积极分子。受他们的影响，我也积极投身罢考，声势闹大了，学校为保住扬州中学的名誉和地位，终于让步，收回开除学生的决定，罢考平息。“九一八”事变，我和胡、孙等同学一起下乡宣传，热血沸腾，主张不要内战，一致抗日。16岁的我写了一首古风《救亡歌》在校刊上发表。胡、孙二位都在我前投身革命，成为革命领导干部。

扬州中学毕业时，胡光世考取清华化学系，我考取清华生物系，我们同赴北平。1937年毕业后，为了抗日，他和同系的黄新民怀着满腔热情，一道投军化学兵部队，驻扎湖南桃源。1938年，我参加“长沙步行团”，曾顺访他们的驻地桃源，我和穿着国民党军装、佩戴军衔的胡、黄二位留下一幅合影。不料“文革”中，“造反派”发现此照片，硬要我交待与国民党军队有何特殊关系。尽管我多次解释是一张同学校友的合影，无任何特殊关系，但未能取得“造反派”的谅解。我和胡光世同在清华读书期间，经历了“一二·九”和“一二·一六”两次革命运

动。胡光世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，他给了我不少革命启蒙帮助，让我从“科学救国”的梦想中逐渐醒悟过来。

1938年后期，胡光世从化学兵部队撤回到清华大学，我们在昆明又重逢了。在西南联大借用的昆华农校大楼前，我和胡光世、李炳国(铁道工程师)三人穿着长衫有一幅合影。

胡光世和我在中学既是同学又是同走读的好友。扬州中学在城西，我和胡光世的家在城东，每天我们都要一道从城东走到城西上学，来回两趟。回来时，我们在城东的最后一站分手，他回花罐街的家，

我回北河巷的吴道台宅第。有时，我还到他家里小憩，听他的堂兄胡宝枢弹古曲，胡宝枢是广陵派传人。三年高中我们相伴，春夏秋冬，从未间断。胡光世在天厨味精厂当老板吴蕴初的秘书，其时胡光世早就是中共党员了。直到解放后，胡光世调北京化工部任部党组成员时，味精厂老板吴蕴初才知道他身边有一个中共地下党员，不免大吃一惊。胡光世一生为党做了许多工作，而生活比较坎坷，有时还比较忧郁，其夫人汪璟因车祸而成植物人，晚年多有不幸，更让我怀念和敬仰。

2010年3月5日于昆明

## 兼 差

○许仲钧(1948经济)口述

张尚元(1948经济)整理

上世纪40年代初，我考上了西南联大。那年秋天，我只身从滇西漾濞小城到昆明，多年的大学梦实现了，又进了向往已久的民主堡垒，我兴奋极了。

在大西门外新校舍报到后，我立即在校园里四处转悠，还到了文林街。文林街较长，一头接大西门，一头到云南大学，附近文化巷、先生坡、小吉坡、西仓坡、钱局街等街巷密集，一直连着翠湖，住了不少教授和同学。文林街上小餐馆、米线店、冷饮甜食店鳞次栉比，特别是茶馆一家挨着一家，是同学们课余活动的地方，有的看书，有的写东西，有的谈天说地打桥牌，十分热闹。

联大是不收学费的，战区来的流亡学生还可以申请助学贷款。但是物价天天上涨，助学金很难养活学生，但我初来乍到人生地疏，到哪去找一份工作呢？心里也有些着急。

当时同学们半工半读很普遍，干工作叫兼差。好一点的工作是在中小学兼课，或给当地人当家庭教师，也有的在美国空军机场仓库当个雇员，或者在工厂商店值夜班、当店员，士、农、工、商、兵、学各界都有。其时昆明还较落后，每天中午在城中心五华山上放午炮，表示12点，晌午了。这个放午炮的差事，也是联大同学兼的差。

我正在文林街上徘徊，忽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我，回头一看，那不是师兄吗？他还是那个样子，身上罩着那件发白的黑皮夹克，宽味帆布裤子，只是那双力士球鞋换了双旧的美军短统大头皮鞋。

师兄姓陆，江苏常熟人，阳澄湖边长大的，幼年父母双亡，初中毕业后就随叔